

■纪 念

抗日烽火中崛起的重庆青年诗群

——写在诗人晏明百年诞辰之际 □张向阳



一九八九年，晏明在艾青寓所

1930年代末，大批抗日进步文人聚集到战时陪都重庆，使这座本来历史文化积淀就厚重的山城，显示出从未有的朝气和战斗张力，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青年诗人群落。他们大都在20岁上下，初涉诗坛却成长迅速，不仅充当抗日中坚的角色，亦成为日后数十年中国诗坛的主脉。

晏明就是其中一员。

从演艺新星到诗坛新锐

1938年，抗日烽火灼烧着年仅18岁的晏明，他决然告别父母，告别湖北云梦家乡，考入著名的忠诚话剧团，踏上抗日救国之路。他随团从武汉，经湖南过贵州再到重庆，一路表演街头剧、抗日话剧，演到情深处泣不成声。俊朗的外形，出众的才华，使他在剧团占有一席之地，他导演并主演的话剧《雷雨》得到时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曹禺的激赏，力邀晏明免试进入这座全国戏剧人仰慕的圣殿。

而此时，晏明已悄然皈依缪斯，笃定只有诗歌才能彻底释放并燃烧他的爱与恨。除了演出排练，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泡在沿途的图书馆，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和文学书籍，阅读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叶赛宁，阅读艾青、臧克家、田间……他开始狂热地写诗。

1939年，剧团在重庆公演阳翰笙的抗日名剧《李秀成之死》，轰动全国，晏明却宣布了令全团都惊愕的辞职决定，躲到租住的陋室里写诗去了。

在无数渺无音信的投稿之后，1940年阳春四月，处女作《涪水之春》在颇具影响的重庆《国民公报》刊登，从此他的抗日诗歌像是打开闸门一发不可收，在重庆以及桂林、衡阳、武汉、长沙、香港等地四处开花。他的长诗常常占据报纸副刊的大半个版面，诗句犀利短促，喷射着刺目的血色和激情。

晏明的迅速崛起得益于重庆浓烈的抗战浪潮。“抗日”成为人们相识、相知的热词，是划界分群的标尺。进步文化界在这里以碾压式的主导力掀起一波又一波抗日宣传。1941年端午节，首届中国诗人节在重庆举行，由郭沫若主持大会，茅盾、老舍、阳翰笙、胡风、冯乃超及著名作家、诗人百余人出席。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布置下，先后举办了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臧克家、王亚平的祝寿活动。每一次活动都是进步文化界的节日，是对民主抗日力量的呼唤。各种规模的诗歌朗诵会更是随处可见。诗歌在民族危难之际，在重庆显示出它独有的投枪与匕首的威力。

晏明有幸亲临这些活动，年轻的生命在诗歌和抗日双重高密度洗礼下迅速成长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他结识了茅盾、郭沫若、老舍、胡风、田间、臧克家、何其芳、姚雪垠、刘白羽、王亚平、常任侠等文学家。巨人的耳提面命，令他受益终生。晏明的《涪水之春》是被著名作家靳以教授慧眼识珠，从稿堆里捞出来的，屡屡退稿使晏明心灰意冷，已经决定另择他途为国立效力。靳以的伯乐识马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。此后多年，靳都以极大热情关注着这位年轻人，不断校正着那双蹒跚的诗的脚步。

然而，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走进他生命深处的，更多的是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诗人。他们中有大学生、文艺秘书，还有不少饥肠辘辘的失业者。国难当头皈依缪斯并不浪漫，不仅要面对黑暗势力的威胁挤压，更现实的是天天要饿肚子。茶馆是这些穷诗人乐此不疲的聚晤之处，叫上一壶清茶就可以高谈阔论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。

这个以抗日为硬核的青年诗人群落来去自由，既有形又无形，相见一次或许就会相知一生。晏明与当时在中华大学读书的地下共产党员、青年诗人沙鸥邂逅，就注定了55载的生死之交。尽管各自经历了只有小说中才有坎坎坷坷与不幸，是诗歌令他们相扶相携，走完了蹉跎人生。

重庆青年诗群没有惯常的文人相轻，更没有尔虞我诈，在抗日大旗的映照下，显现出共有的真纯、笃诚而又求新进取的特质，以致秉持了终生。即使几十年后重逢，相互看到的仍然是当年的彼此，只是多了几分沧桑。如果把当时活跃在重庆的青年诗人罗列出来，你会为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吃惊：光未然、戈宝权、徐迟、沙鸥、袁水拍、柳倩、苏金伞、牛汉、彭燕郊、邹荻帆、王晨牧、君野、吕亮耕、甘永柏、徐放、魏荒弩、曾卓、吕剑、陈敬容、唐祈、绿原……无需讳言，当时他们还很青涩。但当他们经历过重庆熔炉的淬炼，穿越了生与死，最终叩开新中国的大门，便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诗歌史的书写者和缔造者。在共和国初创的几十年中，他们的名字仍然熠熠发光，是烛照新中国诗歌星空的耀眼一群。

从重庆诗群到全国诗群

由于大批文人骤然聚集重庆，再加上经济凋

敝，文化职位极为稀缺。晏明在重庆的四五年间，六次失业，就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不得不借住在大学校学生床铺之间的地板上，或是蜷缩在印厂车间阴湿的地面。1945年初春，远在湖北的妻子即将临盆，而他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深夜绝望地徘徊在嘉陵江边，准备随急流而去。诗友们找不到他，打着火把跑到江边拼命呼叫……晏明才得以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其实，大多数革命文学青年都有着共同的遭际。徐迟最先是以诗人样貌跻身文坛的。1940年他来到重庆谋得中国电影制片厂编辑一职，仅仅一年便流亡香港。1943年返回重庆，在郭沫若麾下编辑《中原》杂志，之后又不得不跑到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充当翻译；沙鸥同样是颠沛流离，在重庆、川北、上海、香港等地辗转谋生。



一九五〇年，晏明左与万成（右）、沙鸥（前）在到京后在长城望京石合影

不过有时也会爆出绝处逢生的意外：重庆官方就曾劝说晏明，希望他到政府文化部门任职，一家人从此就可以衣食无忧。但他拒绝了，每一个坚定的革命文学青年，都会用行动诠释“富贵不能淫”这句民族经典。

可喜的是，那些从重庆走出来的青年诗人，很多成为报纸副刊、文学杂志的编辑或主编，在他们周围又衍生出一个新的诗群。

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，也是一个生命能够得到极度张扬的时代。例如，王亚平组织的“春草诗社”享誉全国，编辑出版了一批很具影响的诗人丛书；沙鸥与音乐家李凌等人在上海创办《新诗歌》月刊，名重一时；深得胡风赏识的徐放，先是在川北任《文学月刊》编委，后又回到重庆与骆宾基一起编辑《东北文化》周刊；彭燕郊相继在桂林的《力报》和《广西日报》主编副刊；王晨牧则在湖南衡阳《大刚报》主编文艺副刊《阵地》……

1942年5月，晏明则直驱抗日第一线，来到湖北郝穴，主办第六战区地方部队的《胜利报》（四开，周刊），编辑、记者一身兼。为表达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大义，临行前给未婚妻北野写了一首决绝诗《假如，我战死》。

他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采访，随时准备殉国。10个月时间搜集了大量素材，以“战地诗草”为副题，先后写了50多首抗日前线诗歌，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。一次，日寇半夜发起攻势，晏明单人独骑去找司令部，发现村口非常漆黑。一位老汉焦急地向他喊：“鬼子进村了！快掉头……”晏明刚刚掉过马头，飞奔出村，敌人的弹雨就从背后呼啸而过。这样死里逃生的经历不止一次。

1943年5月，在诗友力荐下，23岁的晏明担当起《武汉日报》文艺副刊《鸚鵡洲》的主编。《武汉日报》是全国有影响的大报，副刊每周出版六期，主编和编辑都是一个人。困难的还不是人手少、发稿量大，这家报纸的社长宋漱石、总编辑张考祥都持反共立场。当时湖北省政府的主席又是陈诚，乃蒋介石的亲信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要把副刊办成进步文艺界的阵地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幸好有重庆进步文艺界作后盾，虽有不少人已经离开，但相互间都保持着热络的联系。臧克家、王亚平、沙鸥、甘永柏、邹荻帆、牛汉、柳倩、秦耿等人不仅带头为《鸚鵡洲》写稿，还积极组织周围作家、诗人为晏明提供稿件。一批批评击现实、向往光明、反映百姓疾苦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源源不断地涌向编辑部，建构起《鸚鵡洲》的主基调。

晏明的出色工作令两位社领导为副刊显露出的左倾色彩而恼怒。他们不时向晏明发难，有些作品被国民党省党部特务机构及省新闻检查所追查。晏明此时已变得十分老练，摸索出一套对付的办法，软硬兼施，屡屡化险为夷。

1944年初冬，当晏明离开《武汉日报》时，又一

次经历了政治、办报、创作诸方面的严酷历练，带着七分成熟、三分锐气返回重庆，一个即将创办的文学杂志呼唤着他。

从《诗丛》到《大众诗歌》

那个年代，凡眷顾缪斯的青年人，大都怀有创办诗刊的憧憬。那是一片专属的净土，可以大胆宣泄自己的情感和对诗的主张。但是真正能够走进这个憧憬的人却寥寥无几——关键问题不是刊号，而是资金。

1941年初，一直深陷失业泥沼的晏明，异想天开地向办刊“禁区”进发，他惟一的理由就是：在抗日汹涌浪潮中，大城市惟有重庆没有诗刊。这位年方21岁的初生牛犊，先后叩开了郭沫若、老舍、臧克家、田间、王亚平、徐迟、柳倩的家门，向他们请教，也请大咖们赐稿。“为抗战而歌，为民族解放而歌”是办刊的惟一标准。资金方面，与合伙人非北、宋潮各掏一点；让印刷厂先印刷，卖掉书后再付印刷款；请书店先付款后售书……《诗丛》创刊号就这样闪烁着羸弱的光焰，出现在重庆诗坛地平线上——1942年3月，将永远镌刻在晏明的生命年轮中。

然而，骁勇的年轻人终究没能迈过资金门槛，第二期拖至5月份才勉强出刊，此后各期就茫然无望了。晏明和他的同伴依旧执拗地为这个命运多舛的“婴儿”奔走呼号。终于，1943年诞生了第三期，并借《新湖北日报》副刊出版了《诗丛》恩施版（半月刊），共六期。晏明像是跑过超长马拉松，精气耗尽，《诗丛》不得不无疾而终。

多年过后，晏明谈起这段往事隐现出丝丝骄傲：因为《诗丛》填补了重庆抗日诗坛的空白，在民族危难时刻发出了如火似电的呼啸。

当新中国大幕徐徐开启，诗人们的憧憬与才情再次引燃。

王亚平、沙鸥和晏明当年在重庆结识，同为《诗丛》殒精竭虑，现在殊途同归又聚首北京，且同时供职于北京《新民报》，三人分别担任总编辑、副总编辑和文艺副刊部主任。

当欢庆的锣鼓敲毕，诗人们有些落寞：一个旭日般的泱泱大国，一片有着3000年诗歌历史的沃土，怎能没有一本诗刊？人们希望尽快破解这个谜题。

王亚平、沙鸥是最积极、最热情的奔走者，1950年1月1日，新中国首创的大型诗刊《大众诗歌》诞生了！大众诗歌社成立大会盛况空前，在京的最优秀诗人都纷纷赶来。《大众诗歌》编委由王亚平、臧克家、艾青、田间、杨扬、袁水拍、沙鸥、晏明组成。王亚平任主编，沙鸥任副主编，沙鸥、晏明为执行编辑。《大众诗歌》的主旨，顾名思义：提倡大众化诗歌，走大众化诗歌道路。《大众诗歌》系月刊，十六开本。由大众书店出版、发行。

郭沫若极为兴奋，提笔挥毫，为诗刊题写了刊名。

《大众诗歌》果然不同凡响，创刊号首印8000册，一抢而空，不得不在一周后再版。

创刊号第一页是毛泽东的手笔“诗言志”三个字，这是1945年为徐迟题写的，系头一次公开发表；郭沫若为《大众诗歌》撰写了专稿《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》，这是郭老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诗歌创作与繁荣发表意见，创刊号可谓名家云集，臧克家、冯至、田间、徐迟、林庚、严辰、王亚平、邹荻帆、沙鸥等都拿出了为新中国放声高歌的新作。

人们无法度量1950年代初始，诗人们到底释放出多大的热情，他们都身兼数职，手中同时料理几份工作，还要拼命创作出一批批新诗作，否则就要掉队。编委们并非空挂虚名，每个月都要聚首，检点过往的一期，确定新一期重点。那是个“激情满怀、万众一心”的岁月，《大众诗歌》始终紧贴着时代的风口发出诗歌强音。

当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时候，《大众诗歌》又联手各界创办了《抗美援朝诗·歌·画丛刊》，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。参加创刊和编辑工作的有诗人王亚平、楼适夷、严辰、沙鸥、晏明、吕剑，音乐家有李凌、瞿希贤、张文纲，漫画家华君武、丁聪、方成。沙鸥、晏明任执行编辑。诗、歌、画聚集一堂，可谓出版与文化界的双重创举。

当《大众诗歌》1950年第12期付梓的时候，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由于文化、出版界调整，诗人们工作多有变动，《大众诗歌》不得不依依惜别她的读者，但历史会永远铭记，在新中国最初的年代，是《大众诗歌》唱出了第一支“诗之歌”。

当然，历史也不会忘记有一批忠诚于缪斯的青年才俊，曾经穿越岁月的重重围剿，为新世界的诞生披肝沥胆。那一个个已经离去的坚毅而青春的面孔，因为深情缅怀而变得清晰英俊，并成为后人心中的永恒。



芭蕉鸚鵡图 江圣华作

■记 忆



华君武(左)与曹禺 邹士方 摄(1989年春节)

对于戏剧大师曹禺，我是先观其剧，再读其书，后见其人的。

上世纪60年代我曾在首都剧场看过北京人艺演出的曹禺名剧《北京人》，那时我年未及弱冠。现在回忆起来仍怦然心动。大师级的作品加上一流的演出，使我深深地陶醉其中。

1966年夏天“文革”初起，“破四旧”，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成了“毒草”。当时西单的中国书店库存了大量的“四旧”书籍，为了及时处理，收回一定的资金，内部允许许介绍信的“革命组织”购买后供批判用。当时开个把介绍信易如反掌。我的小学同学李睿奇拿到了学校的介绍信，开了一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、历史哲学著作书目。来到书店，按打折的价钱购买到了几十本个人喜爱的书籍。其中就有一册《曹禺剧本选》，内中包括三个剧本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北京人》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北风呼啸的日子里，独自一人反锁于蜗居申，坐在熊熊的火炉旁读“禁书”的滋味。

以后的10年正是这些“禁书”哺育了我逐步走上美学、文学艺术的道路。1986年11月25日我因为撰写《宗白华评传》而去曹禺家中采访，宗白华先生的母亲是安徽方氏，曹禺已故的夫人方瑞也是这个方氏家族的一员，论起来算宗先生的表妹，曹禺当然就是宗先生的表妹夫。那次他在我本子上为我题写了“大道本无我，青春长与君”，寄予了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。

1987年我与一位朋友共同撰写了三万多字的《〈原野〉艺术成就论》，寄请曹禺先生提意见。不久他寄回原稿并附信：“邹士方同志：承赐寄来稿《〈原野〉艺术成就论》，十分感谢。奈近几月一直犯心脏病，无力捧读，至感歉疚。兹奉寄寄稿，并致谢忱。敬祝大安。曹禺1987.2.17。”

艺术大师虚怀若谷、平易谦逊的品格令人感动。曹禺先生绝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，总是那么谦和，对于后辈，总是那么亲切地以礼相待，使你增强创作研究的信心。后来这篇研究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发表在《西北大学学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固原师专学报》上。大师后来还写了三张条幅赠我，内容都是唐诗，遗憾的是，现我只珍藏下来一件，内容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。

曹禺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。1988年他转而担任全国政协常委。全国政协大会开幕式后他见到许多老朋友，非常高兴。在晚餐时，话多得不得了，酒也喝得特别多。吴祖光对我说：“曹禺是人来疯！”晚上他可受了罪，他本来就有心脏病，夜里发作起来，连连打电话给服务台，亏得抢救及时，没有出大危险，只好回家静养。

1988年3月我去采访大师，那天正好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陪同香港戏剧家周采茨（周信芳之女）在他寓中访谈。刘先生我本来相熟，而采茨的姐姐采芹（英国著名戏剧家）我又曾经采访过。最后大师建议四个人在一起合了影。这一切使我感受到前辈大师处处奖掖后辈，提携后进的一片赤诚之心！

曹禺寓中悬挂着关山月的《梅花图》，上题：“莫道人间春色满 岂忘雪里寸心丹 一九七九年岁冬于北京 曹禺同志题 关山月”。还有李可染绘赠他的《漓江烟雨图》和黄永玉绘赠的《荷花图》。也有曹禺自书屈原《离骚》句：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不与与。丁卯曹禺”。

3月20日我写了2000多字的对他的采访记请他审定，他看后表示满意，并谈了很多写作的事，“‘敢为常语谈何易，百炼工夫始自然’……‘常语’、‘自然’才是最高的语言艺术，谈何容易？‘李白乘舟将欲行’，都是常语，却是千古不灭的诗句。现在写文言诗尽是旧套子，没有新东西，不现成，不眼前。眼前景、眼前字、眼前的感情写出来才好。”“有的作家苦心炼字，来得不自然。总让人觉得他费了好大劲儿。这同年轻时受的教育和旧时的修养有关。有的作家不是文章别扭，是人别扭。老舍自然，口语化自然。老巴（巴金——笔者）也自然。鲁迅有时用挺深的字，但深刻自然，他的杂文、小说都是这样。《故乡》写他小时候坐乌篷船，听水声，句子简单极了，把眼前水乡的风景和真挚的感情织在一块儿。”“至于我，有时自然，有时不自然。我岁数大了，才知道写作不好刻意摆弄。我有许多真话要说，可一到笔下就涩了。我不是怕打棍子。我想写一点好东西，但我的苦恼是写不出来。不是唐僧念的紧箍咒，反而是我自己的紧箍咒……让我写《明朗的天》，我不愿意写，但没有办法……”

望着曹禺大师那真诚而痛苦的神情，我感到有一股电击般的震动。曹禺先生十分激动，他在我的本子上奋笔疾书：“敢为常语谈何易 百炼工夫始自然。土方兄留念 曹禺 一九八八.三.廿日”

大师的期望，岂止对我一个人呢？

1988年春天我与曹禺先生有过一次长谈。话题从他新任全国政协常委开始：“我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委员，那时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政协大会，心情十分激动。以后一直在全国人大。现在，30多年后又回到了政协，可以说是回到了自己的家。我当然高兴，各个方面的熟人朋友都在政协，又可以时常见面了。政协范围这么大，包罗了那么多的人，真是了不起。从政协的发展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。十三大以后，民主空气确实比以前浓厚了。现在说了过头的话，说了错话，再没有人打棍子。政协的各方面人士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，得到采纳，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贡献。另外，政协在某种意义上，是起了润滑剂的作用，这种作用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。这次请吴祖光继续担任政协委员，就很说明问题。他最近完成了电影剧本《孟姜女》，寄给我看，十分精彩。”

艺术家的思维敏捷，讲起话来滔滔不绝，并伴随着各种手势，颇富戏剧性：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感到太阳出来了，朝气蓬勃，欣欣向荣。我始终认为，中国知识分子是爱国爱人民的，也是爱党的……科学方面我有自豪感，体育方面我有自豪感，文艺方面我也有自豪感。我们的文学艺术大大地进步了。我仅举两部电影和两部话剧为例。《老井》和《红高粱》在国际上得奖不是偶然的，我看了确实不错。我们敢于把中国落后的地方放开给别人看，就是需要胆量的。只有看到自己落后方面，迎头赶上，才能进步。《老井》赞颂了中国人民不甘落后，不做自然的奴隶的奋斗精神。100年没打出井，现在终于打出来了，这象征着中国的复兴。对土地深沉的情怀，对妇女解放和爱国主义的讴歌，是《红高粱》激动人心的主旋律。主人公自己选择爱情，争取爱情，多么大胆，这与《牡丹亭》和《西厢记》中唧唧我我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完全不同。有人说：你们专写中国的落后，外国人专门看中国的落后，因此才得奖。这不对，这是保守的说法。话剧《狗儿爷涅槃》和《桑树坪纪事》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面貌，反映出封建主义、官僚主义等等对农民的压迫。有人说这是给共产党抹黑，我说不，这是勇敢，勇敢才能面对现实。中国是一个农业国，土地问题、农民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题材，需要很好地反映。”

最后他谈起他的苦恼：现在开会太多太长，一年之中占去了大部分时间。他希望能在这几年做点实事，写点东西。他毕竟是78岁的老人，记忆力已越来越差了。

我曾为曹禺先生拍过一些照片，其中一张他与漫画大师华君武的合影颇为自然。两位大师微笑着，戏剧大师还把一只手搭在漫画大师的肩上，十分亲切。时在1989年春节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曹禺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。他除了留给我们宝贵丰富的戏剧遗产，还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。

曹禺的真诚和痛苦

——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

□邹士方